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丛书 ■ 欧荣 主编

与 “东方主义”
现代主义:

庞德和威廉斯诗歌中的华夏遗产

Orientalism and Modernism:

The Legacy of China in
Pound and
Williams

钱兆明 - 著 徐长生 王凤元 -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丛书 ■ 欧荣 主编

“东方主义” 与 现代主义：

庞德和威廉斯诗歌中的华夏遗产



钱兆明 - 著 徐长生 王凤元 -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庞德和威廉斯诗歌中的
华夏遗产 / 钱兆明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3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丛书 / 欧荣主编)

书名原文：Orientalism and modernism: the
legacy of China in Pound and Williams
ISBN 978-7-308-15670-7

I. ①东… II. ①钱… III. ①诗歌研究—美国—现代
IV. I7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4086 号

ORIENTALISM AND MODERNISM, by Zhaoming Qian

©1995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2016 b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庞德和威廉斯诗歌中的华夏遗产

钱兆明 著

徐长生 王凤元 译

丛书策划	阮海潮
责任编辑	诸葛勤
责任校对	杨利军 於国娟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68 千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670-7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bs.tmall.com>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欧 荣

编 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耿幼壮 李维屏 刘 军(童 明) 陆建德 钱兆明 吴 笛 殷企平

本书编、译人员及分工

欧 荣 全书策划、撰写译本序、校译、定稿

徐长生 翻译第二部分及注释

王凤元 翻译致谢、前言、结束语、第一部分及注释等

译本序

本书作者钱兆明先生于 1944 年出生于上海，早年师从中国外语界泰斗王佐良、许国璋两位大师，专攻中英比较文学，并协助许国璋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协助王佐良编《文苑》、《外国文学》等刊物。1986 年钱先生赴美攻读美国文学，1991 年获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历任耶鲁大学“H. D.”研究员、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员、新奥尔良大学首席教授、浙江大学永谦讲座教授、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特聘教授等职，现任杭州师范大学“马云教育基金”讲座教授。



钱先生在英美文学研究领域取得很高的学术造诣，荣获多项美国国家级人文、哲学等研究基金，著有 8 部学术专著和 60 余篇学术论文。其代表作《“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Orientalism and Modernism*, 1995）和《中国美术与现代主义》（*The Modernist Response to Chinese Art*, 2003）曾赢得美国现代主义研究泰斗休·肯纳（Hugh Kenner）、美国现代语文学会（MLA）前任主席玛乔瑞·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和牛津大学文学教授罗纳德·布什（Ronald Bush）的盛赞。他曾经应邀在美国耶鲁大学、英国剑桥大学、西班牙萨利曼卡大学，以及中国的多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做过学术报告，还为美国现代语文学会和美国现代主义研究会（MSA）组织过多场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外享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

钱先生在《“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一书中修正并发展了西方著名学者爱德华·沃·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东方主义”理论。萨义德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 1978）一书的绪论中已指出，对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和英

国人)而言,“东方”是指近东(中东);而对美国人而言,“东方”更可能是与远东(主要是中国和日本)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钱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他使用的“orientalism”不同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的概念:后者的“东方”主要指近东的伊斯兰国家,而钱著中的“东方”则主要指远东,尤指中国;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是个抽象的文化和政治概念,而钱著中的“东方主义”主要是个文学概念,具体指20世纪初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韦利(Arthur Waley)等西方学者对中国诗人的译介和研究。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界定自身的一个参照物。而钱著研究的是美国现代派诗人对中日代表的东方诗歌的模仿和借鉴,故钱先生所用“orientalism”实指“东方文化”,有别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钱先生指出,20世纪“东方”的核心已由萨义德所言的近东与印度转入远东,即中国与日本。他提出,远东文化同法国象征主义和意大利文化一样,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典诗歌的“西渐”,不仅丰富了美国现代派诗歌的题材和表现形式,如画面感的营造、意象的并置、语言的凝练等,还促进了美国现代派诗歌对佛道思想的融入。钱著以翔实的论据和第一手文献资料论证美国现代派诗人埃兹拉·庞德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如何从英译汉诗中汲取营养,实现现代派诗歌的新突破。此学说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肯纳称此书为研究现代主义文学之“必读专著”。书中提出的“东方文化与现代主义”理论推动美国现代语文学会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专题论坛列入1995年芝加哥年会,促成三届“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1996,耶鲁大学主办;2004,剑桥大学主办;2010,浙江大学与杭州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其规模和影响力呈持续上升态势。这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汇同其他相关学术会议的成果,使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成为当今显学。这些研究致力于探讨东方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重新认识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深远影响),以及现代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价值,为研究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国学者加入国际学术对话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也为我们思考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命题提供参照。

我与钱先生相识于2010年6月在杭州召开的“第三届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牛津大学的罗纳德·布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艾拉·纳戴尔(Ira Nadel)和美国哈佛大学的丹尼尔·奥尔布赖特(Daniel Albright)等国际现代主义研究专家。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了解到东方文化与现代主义的“碰撞”,激发了我对中西文化关系研究的兴趣。2011年3月我惊喜地得知钱先生在殷企平教授的引荐下受聘为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特聘教授。2011年4月我有幸入选杭师大首届

“师从名师培养计划”，结对导师便是钱先生。从此我的学术兴趣发生转移，从英国当代小说转到英美现代派诗歌，虽然和钱先生在学术合作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我从中获益匪浅，并乐在其中。2012年8月至2013年8月我受到杭师大“师从名师”项目经费资助，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因为钱先生就住在离伯克利不远的弗莱蒙特，我们定期见面讨论“中国才俊与庞德”的研究课题。2012年至今，我和钱先生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合作发表了六篇论文，我们还与管南异、陈礼珍、叶蕾三位同事合作完成了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中华才俊与庞德》一书，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2015）。至此，钱先生的现代主义研究也形成了一个清晰的渐进发展脉络：《“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考察了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派诗人的影响；《中国美术与现代主义》发掘了西方现代派诗歌中的中国美术渊源，探讨西方现代派诗人如何从中国美术作品中领略儒、道、释思想并运用于现代派诗歌创作；《中华才俊与庞德》从“文本中心”的研究范式转向“人本中心”的研究路径，重点考察美国现代诗人庞德与其中华友人的思想交集，探索出庞德在与中华文化精英交往中不断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脉络。遗憾的是，钱先生的前两部著述虽在国际学界影响巨大，但一直未有中译本，影响了国内学界对他学术思想的整体认识。2015年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设立“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硕士点；为促进学科发展，我们策划出版“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丛书，钱先生的两部著述便成为丛书的首选。

我与徐长生、王凤元两位译者（分别任职于浙江万里学院的外语学院和基础学院）是多年的好朋友。2002年，我们在周纪廉教授的指导下，一起编写《新英汉学生精解词典》，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之后他们二位又与周教授合作编写《新世纪实用英汉词典》，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合作翻译本书的过程中，他们知难而上和认真钻研的精神，让我深表钦佩和感动。编、译者力求完美，如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感谢浙江省一流学科A类建设项目的经费资助和杭州师范大学“攀登工程”二期建设项目的经费资助，感谢钱先生在翻译过程中解答译者的一些疑惑。部分引文的译文参考了国内学者已发表的著述，具体出处将在文中标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最后要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阮海潮主任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的沟通协调以及诸葛勤编辑认真细致的编辑和校核工作。

此书英文原作出版于1995年，译作完成于2015年，也算是献给钱先生原著面世20周年的纪念礼物。

欧 荣

2016年1月

原作致谢

我最应该感谢的是巴里·阿赫恩（Barry Ahearn），是他带我走上了研究庞德、威廉斯和中国诗歌之路，他从始至终关注本书的进展情况并提出许多宝贵建议。感谢杰弗里·哈芬姆（Geoffrey Harpham），是他帮助我拓展研究领域并保持头脑的敏锐。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教授和许国璋教授，是他们引导我从事东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特别感谢休·肯纳（Hugh Kenner），在我的研究初期允许我查阅他个人收藏的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一些诗歌笔记的抄本，其中六首诗入选《华夏集》。在起步阶段，我有幸获得了卡罗尔·弗·泰瑞尔（Carroll F. Terrell）的支持和鼓励。还要特别感谢唐纳德·盖洛普（Donald Gallup），他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问题并帮助查找资料。同样要感谢的还有查尔斯·诺曼（Charles Norman）、阿·沃尔顿·利茨（A. Walton Litz）、詹姆斯·杰·威尔海姆（James J. Wilhelm）、保罗·马里亚尼（Paul Mariani）、罗伯特·杰·贝瑟福（Robert J. Bertholf）、彼得·施密特（Peter Schmidt）、龙安妮（Anne Farrer）、克里斯托弗·戴特（Christopher Date）、詹妮弗·怀特（Jennifer White）、汤高才等，他们回答了我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对玛丽·德·拉齐维尔兹（Mary de Rachewiltz）致以特别的感谢，她不但给予我鼓励，而且准许我使用她的笔记中关于她母亲的内容。特别感谢奥马尔·庞德（Omar Pound），他非常及时地回复了我的咨询。需要感谢的还有多年来一直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的同事和朋友们：约瑟夫·科恩（Joseph Cohen）、唐纳德·比泽尔（Donald Pizer）、菲利普·博利埃（Philip Bollier）、杰拉德·斯奈尔（Gerald Snare）、戴尔·埃德蒙（Dale Edmonds）、迈克尔·博德曼（Michael Boardman）、莫莉·罗滕伯格（Molly Rothenberg）、菲利佩·史密斯（Felipe Smith）、厄内斯特·沙塞尔（Ernest Chachere）、菲利普·库尔特（Philip Coulter）、瑞玛·瑞克（Rima Reck）、玛丽·菲茨杰拉德（Mary FitzGerald）、琳达·布兰顿（Linda Blanton）、麦基·布兰顿（Mackie Blanton）、

约翰·库克 (John Cooke)、伊丽莎白·潘菲尔德 (Elizabeth Penfield)、理查德·凯特罗瓦斯 (Richard Katrovas)、米利亚姆·米勒 (Miriam Miller)、鲍勃·斯特奇斯 (Bob Sturges)、约翰·盖瑞 (John Gery)、辛西娅·霍格 (Cynthia Hogue)、威廉·布拉特 (William Pratt)、马西莫·巴奇伽鲁普 (Massimo Bacigalupo)、安妮·卡尔森 (Anne Carson)、安德鲁·卡佩尔 (Andrew Kappel)、托马斯·惠特克 (Thomas Whitaker)、西奥多拉·拉普·格雷厄姆 (Theodora Rapp Graham)、佩吉·福克斯 (Peggy Fox)、埃德温·肯尼贝克 (Edwin Kennebeck)、山名章二 (Shoji Yamana)、丁往道、林学洪、戴瑞辉、诺娃·瑟瑞夫利 (Nova Thriffley)。

特别感谢许多图书馆的负责人和图书管理员。感谢耶鲁大学拜纳基善本和原稿图书馆 (the 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of Yale University) 美国文学部的主任帕特丽夏·谢·威利斯 (Patricia C. Willis) 和全体馆员, 他们长久以来为我提供了慷慨的帮助。我希望向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图书馆诗歌及珍本部的主任罗伯特·杰·贝瑟福和全体员工表达谢意, 他们积极地帮助我查找十几种期刊。感谢菲尔莱迪金森大学弗伦翰-麦迪逊校区图书馆 (the Florham-Madison Campus Library of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馆长詹姆斯·弗雷泽 (James Fraser) 和全体员工, 他们热心地帮助我查阅有关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的资料。

感谢杜兰大学于 1989 年把“理查德·佩瑞尔·亚当斯奖” (Richard Perrill Adams Award) 颁给我, 次年又向我提供了一笔旅行津贴, 使我的研究启动经费有了着落; 耶鲁大学拜纳基善本和原稿图书馆把 1992—1993 年度的“美国文学 H. D. 研究员”资格 (H. D. Fellowship in American Literature) 授予我, 使我有机会于 1993 年初夏在耶鲁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研究和写作; 我所在的新奥尔良大学于 1993 年授予我“研究理事会基金” (Research Council Grant) 和“暑期学术研究奖” (Summer Scholar Award), 为我完成此书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支持。新奥尔良大学研究办公室和文理学院陆续对我提供了资助, 使我得以支付本书的插图版权等费用。在此一并致谢。

本项目的部分研究内容散见于笔者一些已经发表的文章: 本书第五章的缩减版可见于《派杜马: 庞德研究专刊》(Paideuma) 第 19 卷 1990 年第 1 期和第 2 期; 第七章和第八章是根据《威廉斯评论》(William Carlos Williams Review) 第 17 卷 1991 年第 1 期的一篇修订而成; 第六章的很大一部分曾发表在《20 世纪文学》(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第 39 卷 1993 年第 3 期上。笔者有幸获得了卡罗尔·弗·泰瑞尔、彼得·施密特、布莱恩·布雷门 (Brian Bremen)、

威廉·麦克布莱恩（William McBrien）的许可，获准可再次使用这些内容。笔者曾将本研究的部分内容做过宣讲，比较重要的有两次：一次是在1993年2月于路易斯维尔大学举行的20世纪文学大会上，我宣读了一篇关于庞德与王维的论文；另一次是在同年7月于意大利拉帕洛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庞德学术研讨会上，我宣读了一篇关于庞德与屈原的论文。在此，谨对大家给我的评论和提问表示感谢。我的学生也对我帮助颇多，特别是参加了1992年和1994年我在新奥尔良大学组织的“现代美国研讨会”的同学们更是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灵感。

特别感谢受杜克大学出版社之托通读了本书样稿的两位学者——张隆溪先生和达森布罗克（Reed Way Dasenbrock）先生，感谢他们的鼓励和指点。对于杜克大学出版社的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和雷诺兹·史密斯（Reynolds Smith）的鼎力支持，笔者深表谢意。感谢琼·布雷迪（Jean Brady）对本书的手稿进行了非常专业的技术处理以便排版印刷。最后，特别感谢你们，美芳、育燕、育黎（钱先生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译者注），谢谢你们的关注、信任和支持。

感谢美国新方向出版公司（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和英国费伯出版社（Faber and Faber Ltd.）授权笔者引用下列埃兹拉·庞德的作品：《诗章》（*The Cantos*，版权所有人为埃兹拉·庞德，1934年、1937年、1940年、1948年、1956年、1959年、1962年、1963年、1966年、1968年）；《埃兹拉·庞德和多萝西·莎士比亚》（*Ezra Pound and Dorothy Shakespear*，版权所有人为埃兹拉·庞德著作权信托公司之受托人，1976年、1984年）；《埃兹拉·庞德在期刊发表的诗歌和散文投稿》（*Ezra Pound's Poetry and Prose: Contributions to Periodicals*，版权所有人为埃兹拉·庞德著作权信托公司之受托人，1991年）；《戈迪埃-布尔泽斯卡》（*Gaudier-Brzeska*，版权所有人为埃兹拉·庞德，1970年）；《文学论文集》（*Literary Essays*，版权所有人为埃兹拉·庞德，1918年、1920年、1935年）；《面具》（*Personae*，版权所有人为埃兹拉·庞德，1926年）；《庞德/乔伊斯》（*Pound/Joyce*，版权所有人为埃兹拉·庞德，1967年）；《庞德书信选1907—1941》（*Selected Letters 1907-1941*，版权所有人为埃兹拉·庞德，1950年）；《罗曼斯精神》（*The Spirit of Romance*，版权所有人为埃兹拉·庞德，1968年）。埃兹拉·庞德和厄内斯特·费诺罗萨所创作的一些未曾发表过的材料（版权所有人为埃兹拉·庞德著作权信托公司之受托人，1995年）经新方向出版公司代理授权本书使用。感谢美国新方向出版公司授权笔者引用下列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作品：《威廉斯诗集（第一卷）》（*Collected Poems*，版权

所有人为新方向出版公司，1938 年；版权所有人为威廉·艾瑞克·威廉斯 [William Eric Williams] 和保罗·赫·威廉斯 [Paul H. Williams]，1982 年、1986 年)；《我想写诗》(*I Wanted to Write a Poem*，版权所有人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1958 年)；《想象》(*Imaginations*，版权所有人为佛罗伦斯·赫·威廉斯 [Florence H. Williams]，1970 年)；《威廉斯论文集》(*Selected Essays*，版权所有人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1954 年)；《威廉斯书信选》(*Selected Letters*，版权所有人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1957 年)。一些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所创作的未曾发表过的材料(版权所有人为威廉·艾瑞克·威廉斯和保罗·赫·威廉斯，1995 年)经新方向出版公司代理授权本书使用。《赠张云容舞》(“Dancing”)选自《松花笺》(*Fir-Flower Tablets*)和《艾米·洛威尔诗歌作品全集》(*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Amy Lowell*) (版权所有人为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 [Houghton Mifflin Co.]，1955 年；版权所有人于 1983 年变更为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布林顿·帕·罗伯茨 [Brinton P. Roberts]、吉·丹德洛·贝林 [G. D’Anselot Belin, Esquire])，经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授权重印。1921 年版的《致白居易》(“To Po Chü-i”)选自《芭贝特·多伊奇诗集》(*The Collected Poems of Babette Deutsch*，版权所有人为芭贝特·多伊奇 [Babette Deutsch]，1969 年)经亚当·亚尔莫林斯基 (Adam Yarmolinsky) 授权重印。叶维廉 (Wai-lim Yip) 所著《埃兹拉·庞德的〈华夏集〉》(*Ezra Pound’s Cathay*，版权所有人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9 年)的节选片段经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授权重印。休·肯纳 (Hugh Kenner) 所著《庞德时代》(*The Pound Era*，版权所有人为休·肯纳，1971 年)的节选片段经休·肯纳授权重印。

承蒙下列机构和个人为本书提供插图：大英博物馆 (the British Museum)、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芝加哥艺术学院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日本京都智积院、上海博物馆、耶鲁大学拜纳基善本和原稿图书馆、芝加哥大学约瑟夫·瑞根斯坦图书馆 (Joseph Regenstei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果尔达·梅厄图书馆 (the Golda Meir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菲尔莱迪金森大学弗伦翰-麦迪逊校区图书馆、奥马尔·庞德先生。

钱兆明

前言

东方在现代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本书中所采用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词与萨义德(Edward 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 1978)一书中的“东方主义”有所不同。萨义德的“东方”特指“伊斯兰东方”,而笔者所说的“东方”指的是远东,特别是指中国。如果说直到19世纪初期,东方“其实指的仅是印度和《圣经》中所涉及的地方”(Said 4),那么到了20世纪初期,东方则主要是指中国和日本。实际上,对于那些现代主义大师——叶芝(Yeats)、庞德(Pound)、艾略特(Eliot)、威廉斯(Williams)、史蒂文斯(Stevens)、摩尔(Moore)——来说,是远东而非近东为他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创作源泉。因此,研究远东对现代主义的影响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对萨义德而言,“东方主义是一个文化和政治事实……”(Said 13),所以他对“东方主义”的研究涵盖着多维度的复杂体系。而笔者的“东方主义”则主要是一个文学概念,我所理解的文学东方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术语,而是指具体的中国诗人(屈原、陶潜、李白、王维、白居易)。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英美学者也注意到这些中国诗人并开始翻译他们的作品。以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赫·艾·翟理斯(H. A. Giles, 1845—1935)、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的作品为媒介,庞德、威廉斯等现代主义诗人得以实现了与这些伟大的中国诗人的对话。对萨义德而言,“‘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用来界定自身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参照(Said 1-2)。虽然萨义德的阐释模式可以找到很多例证,但是考虑到庞德和威廉斯对中国的热诚,笔者认为这种思维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庞德和威廉斯似乎并非持有“西方文化优越论”。其二,把这两位诗人引向东方的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亲和力(“他者”中的“我”)而不是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他者”中的“他”)。所以,笔者在本书中将采用一个完全不同的“东方主义”模式——“模仿”模式,与达森布罗克(Reed Way Dasenbrock)在《模仿意大利人:怀亚特、斯宾塞、辛格、庞德、乔伊斯》(*Imitating the Italians: Wyatt, Spenser, Synge, Pound, Joyce*, 1991)中的“模仿”同义。在这个模式中,中国和

日本不是被视为西方的陪衬，而是现代主义诗人实现自我的具体榜样。达森布罗克没有直言自己的理论基础，但我们可以为其从海德格尔（Heidegger）的阐释学中找到有力的支撑。正如阐释学的主要支持者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言，据海德格尔的阐释学理论，“阐释过程以几个‘先概念’（fore-conception）开始，这些‘先概念’随之被更合适的概念所取代”（*Truth and Method* 236）。

笔者以“东方主义”一词开头，因为它牵涉到本书所要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在1920年前后庞德和威廉斯快速走向“高级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他们对中国诗歌和文化的兴趣在此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笔者不可避免地注意到在现代主义运动中一股被低估了的力量——来自东方的力量（此处的现代主义运动指的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英美诗歌变革运动）。由于本书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将分别着重讨论庞德和威廉斯，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把东方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个大前提做个交代。

张隆溪（*The Myth of the Other: China in the Eyes of the West* 118–119）等评论家已经对启蒙运动时期中国对西方的巨大影响有所探讨，而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到了20世纪初远东对西方文坛的影响变得更具穿透力。首先是20世纪初从远东大量引进的图形艺术（参见 Julia Meech and Gabriel P. Weisberg, *Japonisme Comes to America: The Japanese Impact on the Graphic Arts 1876–1925*, 1990）。对于庞德和威廉斯时代的美国人来说，随着对东方的认识开始起步，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 1854–1919）、厄内斯特·费诺罗萨和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东方馆的名字逐渐变得耳熟能详。在同一时期的英国则有大名鼎鼎的亚瑟·莫里森（Arthur Morrison, 1863–1945）、劳伦斯·比宁（Laurence Binyon, 1869–1943）和大英博物馆的东方绘画分馆。英美对中国和日本的最初兴趣源于一次和东方视觉艺术与东方思想的不期而遇。庞德的朋友约翰·古尔德·弗莱彻（John Gould Fletcher, 1886–1950）记录了他1914年参观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时的感受，颇具代表性。弗莱彻说：“在东方馆的几个小时，用新的眼光审视中国宋代或日本镰仓时代的一些杰作，使我对视觉艺术同我的诗歌在精神上的共通性以及诗人重塑世界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它们使我再次专注于这种重要的本能和自然的灵魂。”（Fletcher, *Life Is My Song* 185）

请注意：吸引弗莱彻的是东方文化的“亲和力”而非“差异性”。有同样感觉的还有华莱士·史蒂文斯和庞德。史蒂文斯在1909年致信埃尔西·莫尔（Elsie Moll）称很多中国山水画的创作灵感和冲动让自己产生共鸣（Stevens, *Letters* 137）。庞德在1913年给多萝西·莎士比亚（Dorothy Shakespear）的信中称在观看大英博物馆里的日本版画时感觉自己“更成熟了，更有智慧了”（*ED* 177）。

请注意这几个时间节点——1909年、1913年和1914年——正是现代主义诗歌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还请注意东方文化中那些吸引英美诗人的因素——历久弥新、丰富多彩的东方文化中的细致、准确、客观、清新，与自然和谐融洽——这些特点无一不是现代主义运动的核心要素。所以，早期的意象主义者（如托·厄·休姆 [T. E. Hulme]、弗·斯·弗林特 [F. S. Flint]）以模仿法国象征主义起步，但很快就拜倒在东方艺术的魔力之下，现在看来这再正常不过了。首先是日本的俳句和短歌，后来就是以陶潜、李白、王维、白居易为代表的更为复杂而精致的中国诗歌。当庞德“根据已故的厄内斯特·费诺罗萨先生的笔记以及森槐南（Mori）和有贺长雄（Ariga）教授对这些中国诗歌的解读”（P 130）编译成《华夏集》并于1915年出版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现代派大家——叶芝、福特（Ford）、刘易斯（Lewis）、艾略特、威廉斯——无不为其的清新、雅致和简洁而赞叹不已。这其中的原因也绝非偶然，福特说，“如果这些诗是庞德的原作，那么他就是当今最伟大的诗人”（转引自 Stock 174），表明东方人的感受在福特这位英国现代派作家和评论家的心中得到认同。

在庞德的《华夏集》影响之下，20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出现了竞相模仿东方诗歌艺术的热潮。1920年前后，一些小型杂志，如芝加哥的《诗刊》（*Poetry*）和《微言评论》（*The Little Review*），纷纷登载英译中国诗歌或者中国、日本诗歌的仿作。在同一时期，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和弗洛伦斯·埃斯库弗（Florence Ayscough）合译出版了一本中国诗集（即《松花笺》[*Fir-Flower Tablets*]——译者注），里面写道：“当前中国诗歌颇得人心，我等当更加努力，怠慢不得。”（MacNair 76）1913—1916年间，叶芝与庞德合作密切，也同样患上了“东方热”（*Far East Fever*），叶芝的兴趣主要是日本的能剧（*Noh*）。他在1916年曾说过：“我找到了自己的样板——如果我们不是文学暴发户的话，必须有自己的样板——我的样板在日本贵族的能剧舞台上。”（Yeats, *Four Plays for Dancers* 86）

很多东方诗歌的模仿者，例如史蒂文斯和弗莱彻，后来都公开表示从中国和日本受益良多。当罗纳德·雷恩·拉蒂莫（Ronald Lane Latimer）采访史蒂文斯并问到东方对他的现代主义是否有影响时，史蒂文斯坦率地说：“有的，我认为我受到了中日抒情诗的影响。你问我是否曾经‘刻意地追求某些品质’，我的回答是‘很有可能’。”（*Letters* 291）其他人，如威廉斯和摩尔，则没有公开透露过自己的作品和远东的关系。在本书的第二部分，笔者将拿出一些文本证据来证明在1916—1921年间威廉斯如何在庞德《华夏集》的启发和影响下，先后通过翟理斯和阿瑟·韦利的作品与中唐诗人白居易展开严肃的对话，以及这

场对话如何导致他在初期的现代主义诗集《酸葡萄》(*Sour Grapes*)和《春天及万物》(*Spring and All*)中采用了来自中国的诗歌理念和创作手法。至于摩尔和中国的关系,笔者只能另寻机会进行探讨,她在作品中数次触及中国主题,并在创作中采用了“与中国很有亲缘关系的客观性手法”(Fletcher, *Selected Essays* 79)。在现代主义诗人阵营中,艾略特选择了印度而不是中国和日本来代表东方精神,这是比较少见的。但他还是对中国怀有深深的敬意。谈到他在哈佛就读时的导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痴迷于儒家哲学”时,艾略特说:“我对中国的智慧和文明怀有最崇高的敬意;我愿意相信鼎盛时期的中国文明至高至上、至善至美,甚至令欧洲显得粗俗不堪。”(Eliot, *After Strange Gods* 43)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同法国象征主义和意大利文化一样,东方主义也是构成20世纪一二十年现代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在此笔者无意低估法国和意大利的影响力,雷奈·多班(René Taupin, *L'Influence du symbolisme Français sur la poésie Américaine*, 1929)和斯科特·汉密尔顿(Scott Hamilton, *Ezra Pound and the Symbolist Inheritance*, 1992),还有达森布罗克(*Imitating the Italians: Wyatt, Spenser, Synge, Pound, Joyce*, 1991)在各自的著述中对法国和意大利在现代主义中的作用都有过论证。笔者更认同“多元文化模式”的说法,既认可东方也认可其他各种力量对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现代主义是国际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物和现象,东方在其中的影响力自然是不容忽视的。

笔者试图以此书论证东方在现代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但这个论证显然并非尽善尽美。一本理想的全面论述东方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著作应该再涵盖两三个现代主义的知名人物——叶芝、艾略特、史蒂文斯等等。但如此的话,一则工程浩大,二则有违笔者“庞德—威廉斯二元体系”的写作初衷。(确实,在现代主义运动中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二元体系组合——叶芝—庞德、庞德—艾略特、庞德—H. D.、威廉斯—史蒂文斯、威廉斯—摩尔等等,但是庞德—威廉斯的二元组合似乎处于更核心的位置。)幸运的是,关于东方对叶芝、艾略特等现代主义诗人的影响已不乏专门论述(例如:内藤史郎[Shiro Naito]的 *Yeats and Zen: A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 Mask*, 1984; 关根胜[Masaru Sekine]的 *Yeats and the Noh: A Comparative Study*, 1990; 帕·斯·斯里[P. S. Sri]的 *T. S. Eliot, Vedanta and Buddhism*, 1985; 阿沙克·库马·贾[Ashok Kumar Jha]的 *Oriental Influences in T. S. Eliot*, 1988; 阿玛·库玛·辛格[Amar Kumar Singh]的 *T. S. Eliot and Indian Philosophy*, 1990)。换言之:拙著如其他论述现代派诗人和东方主义的作品一样,是需要各方协力而为的一个庞大工程的一部分——区区一本书在这样的庞大工程面前无异于沧海一粟——这个大工程的任务就是在

整体上重新评估东方在现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义，笔者试图探讨庞德和威廉斯作品中的华夏遗产，但在本书中却只字未提中国元素对这两位现代主义大师更重要的晚期作品的影响。其原因在于，笔者的研究重心主要放在 1913—1923 年间庞德和威廉斯快速走向现代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元素所起的作用，如果面面俱到的话，则可能流于空泛，从而削弱对中心议题的论证。而且，已经有一些评论家对庞德的《诗章》和后期抒情诗中的中国影响做过研究，著名的有休·肯纳（Hugh Kenner，《庞德时代》[*The Pound Era*, 1971]）、詹姆斯·威尔海姆（James Wilhelm，《庞德的后期诗章》[*The Later Cantos of Ezra Pound*, 1977]）、约翰·诺尔德（John Nolde，《东方之花：庞德的中国诗章》[*Blossoms from the East: The China Cantos of Ezra Pound*, 1983]），简单地重复或赘述他们的观点并没有太大的学术意义。

下面，本书就将追踪和探讨 1913—1923 年间庞德、威廉斯与一些伟大的中国诗人——屈原、李白、王维、白居易等等——之间的对话，并将考证这些对话对两位诗人在完善现代主义传统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书将讨论中国元素在庞德的早期作品（指他在拿到费诺罗萨遗稿前对已有英译汉诗的改写）（1914）、《华夏集》（*Cathay*, 1915）、《献祭》（*Lustra*, 1916）、《第 1-41 诗章》（*Early Cantos*, 1915—1919）以及威廉斯的《酸葡萄》（1921）和《春天及万物》（1923）中所发挥的影响力，包括以图像形式呈现的道德操守与规范（指《女史箴图》——译者注），省略与含蓄、典故、并置等创作手法以及道家/佛教禅宗¹的“无/有（空/色）”的观念。

虽然笔者的研究大量依赖史料（包括来自耶鲁大学拜纳基善本和原稿图书馆的一些未发表过的珍贵资料、大英博物馆和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等的图片资料），但重点还是对来自不同文化和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一切欣赏和影响的基础皆来自内在的亲合力。庞德和威廉斯所继承的美国超验主义、希腊文化和欧洲现代主义——这些都是东方主义的近亲——为他们在 1913—1923 的关键十年里欣然接受远东文化遗产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钱兆明

1994 年 1 月

目 录

译本序	I
原作致谢	V
前言：东方在现代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1
第一部分 庞德的中国之路	1
第一章 “四面都是东方”：比宁、阿普沃德和费诺罗萨	3
第二章 假翟理斯之手：屈原、刘彻和班姬	16
第三章 《意象派诗选》：中国和希腊	41
第四章 通过费诺罗萨的探索：概览	48
第五章 假费诺罗萨之手：《华夏集》中的道家思想和漩涡主义	55
第六章 模仿王维：走近《诗章》	79
第二部分 威廉斯早期与中国文化的碰撞	101
第七章 “请现出你的娇容，杨贵妃！”	103
第八章 白居易的影响无处不在：《酸葡萄》	118
第九章 在《春天及万物》中跨越旧模式	133
第十章 追求极简、灵活的形式	149
结束语 一个文学时代的发端	163
附录 I 费诺罗萨《送友人》笔记（打字稿）	167
附录 II 庞德译八首王维诗手稿（打字稿）	169
附录 III 菲尔莱迪金森大学等地威廉斯“东方”主题私人藏书书目	177
原作注释	179
原作参考文献	205